



业界、学界和普通观众眼中的《焦点访谈》栏目

聚焦《焦点访谈》

郭镇之 赵丽芳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业界、学界和普通观众眼中的《焦点访谈》栏目

聚焦《焦点访谈》

郭镇之 赵丽芳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电视新闻述评节目《焦点访谈》作为个案,围绕“电视新闻评论”和“批评性报道”的结合部,对舆论监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并认真地探讨分析了与电视批评报道和新闻舆论监督相关的理论、实践和对策问题。

读者对象为媒介研究者、从业者和关心《焦点访谈》栏目的广大读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901104297 13801310933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焦《焦点访谈》/郭镇之,赵丽芳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

ISBN 7-302-09586-8

I. 聚… II. ①郭… ②赵… III. ①中央电视台-评论性新闻-电视节目-制作-经验 ②新闻工作-舆论-监督-研究-中国 IV. ①G222.3 ②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7025号

出 版 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客 户 服 务:010-62776969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65×240 印张:23.25 插页:2 字数:446千字

版 次: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9586-8/G·518

印 数:1~4000

定 价:38.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以及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5-3103 或(010)62795704

前 言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北京广播学院关于《焦点访谈》的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编号 98BXW004)。课题负责人是郭镇之研究员。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最终将研究集中于电视新闻述评节目《焦点访谈》,以此作为个案,围绕“电视新闻评论”和“批评性报道”的结合部,对舆论监督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认真探讨、分析了与电视批评报道和新闻舆论监督相关的理论、实践和对策问题。

本书是在原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主要的改动:一是突出主题,即突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舆论监督及批评性报道活动和新闻工作者的作用;二是精简内容,删去了部分背景资料 and 研究成果中的量化图表;三是更新材料,在新闻工作者访谈部分增加了若干新的采访对象。本书目录中的“焦点”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在不同的情况下,分别指《焦点访谈》栏目、舆论监督的“焦点”现象和新闻媒介在从事舆论监督工作中遵循法纪、把握政策的“焦点”问题。

本书有若干特点:第一是学术性。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了国内目前还不常见的“焦点群体访谈”研究、对数据统计资料的“二度分析”研究、“内容分析”研究,在操作中力求严谨、规范,对“焦点”的论述增加了研究深度。第二是可读性。课题组对新闻工作者进行的大量访谈披露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生动体验,这可能成为本书吸引读者阅读的一个特点。

本书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焦点’自述”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的专业人士对《焦点访谈》发展概况的介绍,包括经验体会文章与课题组对记者编辑的访谈;第二部分“评议‘焦点’”是对地方新闻工作者围绕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主题的访谈;第三部分“论证‘焦点’”是专家学者对《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表现、批评报道的“焦点”现象和法规政策“焦点”问题的深入论证;第四部分“研究‘焦点’”是课题组撰写的总报告和专项报告等研究成果。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南京电视台、广州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接受调查的单位(例如安徽省淮北市广播电视局、广东省羊城晚报社、上海市工商局、上海市卫生局)给予我们的研究很大的支持。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研究处设立了配套的研究项目“《焦点访谈》研究”,并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的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或者总编室提供了必要的录像带和文字资料。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观众联系处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并进行了部分分析处理。有 31 位身在新闻传播及舆论监督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接受了我们的深度访谈,文章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得。被



访者包括：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栗国安；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玉胜、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焦点访谈》一组制片人关海鹰、二组制片人赵微、中心组制片人孙杰、记者柏杨、李玉强、包军昊；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江洁红、总编室主任朱江、《今日话题》制片人王琪、记者刘奇；上海电视台台长朱咏雷、新闻中心主任蒋为民、新闻中心编辑部主任王一敏、新闻评论部记者陆天旗；东方电视台副台长陈梁；江苏电视台副台长戴听祥、新闻中心副主任高顺青、《大写真》制片人安殿成、记者李建勋；广东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蔡照波、《社会纵横》副总监李楚玲、《社会纵横》制片人陈光文；南京电视台副台长郭秀君；广州电视台副台长涂布、社会生活部主任杨宇华、《城市话题》总监朱毅、李江明，副总监、制片人高筠。10位新闻传播学者以笔谈的方式提供了他们的意见，这些专家是（按姓氏拼音排列）陈力丹（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程世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段京肃（时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黄匡宇（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邵培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旭培（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童兵（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徐耀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魏永征（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在此，向专家学者、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先后参与调查研究工作的广播学院师生主要有朱羽君教授、刘燕南博士、沈浩副教授，研究生魏毅、何勇、孟颖、赵丽芳、郝蕴红、沈文璟和王潇月等；媒体中，参与工作的有中央电视台时任新闻评论部主任的袁正明和编辑王旭东、记者张涛同志，上海广播电视局的沈莉博士、张亚敏编辑，北京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朱江主任、秦新春博士等。时任中央电视台研究处主任的王录高级编辑、副主任王甫博士作为合作研究的参与者和委托方，监督并指导了研究工作的进行。

研究工作从1998年开始，至2001年结束。评审专家方汉奇教授、丁淦林教授、叶家铮教授、王录高级编辑、丁俊杰教授对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孙五三等学者在引用研究成果的同时，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建议。

最后，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出版；感谢纪海虹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感谢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提供了部分出版资金。

郭镇之

2004年2月18日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编 “焦点”自述 /1

- 《焦点访谈》的发展概况 袁正明 王旭东 /3
- 新闻舆论监督的成功实践——关于《焦点访谈》栏目的思考 梁建增
孙金岭 /16
- 把握与平衡——访孙玉胜 /21
- 支持《焦点访谈》就是支持舆论监督——访梁建增 /26
- 全面、长远地看舆论监督——访赵微 /32
- 深刻、准确、典型、好看——访关海鹰 /39
- 《焦点访谈》应该在经营上下功夫——访柏杨 /42
- 《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访孙杰 /47
- 《焦点访谈》：特殊时期的产物——访李玉强 /57
- 做这样的东西需要一种精神状态——访包军昊 /70

第二编 评议“焦点” /75

- “焦点访谈”研究课题组采访新闻工作者的提纲 /76
- 舆论监督是人民的监督、社会的监督——访栗国安 /77
- 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一定要切合实际——访江洁红 /82
- 改变思维方法，加强舆论监督——访朱江 /89
- 呼吁制定一部开放性的《新闻法》——访王琪 /96
- 舆论监督与行政、法律的监督应该相辅相成——访刘奇 /102
- 在舆论监督方面，上海有上海的问题——访朱咏雷 /107
- 广泛的“舆论空间”——访陈梁 /115
- 真诚面对事实，真诚面对观众——访蒋为民 /121
- 在开放的前提下进行约束——访王一敏 /129
- 客观是上海媒体建立权威性的重要原因——访陆天旗 /135
- 宣传纪律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很重要——访戴昕祥 /142
- 做监督类的节目，激情尤其重要——访高顺青 /145
- “用事实说话”是根本——访安殿成 /152
- 只要能促进问题的解决，节目“毙”了也高兴——访李建勋 /156
- 我不赞成电视节目做“回音”报道——访蔡照波 /158
- 事实的力量更大——访李楚玲 /161



- 必须给被批评者辩解的权利——访陈光文 /164
真相调查需要记者的功力——访郭秀君 /167
“隐性采访”可用,但不能滥用——访涂布 /171
媒体要受法制制约——访杨宇华 /174
用事实说话是我们一贯的原则——访朱毅 /177
行使监督的关键是政府官员首先要接受监督——访李江明 /180
没有《新闻法》,传媒很尴尬——访高筠 /183

第三编 论证“焦点” /187

- “焦点访谈”研究课题组提供的专家笔谈提纲 /188
舆论监督永远是传媒的自身功能之一 陈力丹 /189
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的统帅 程世寿 /197
舆论监督力度应加大 段京肃 /199
舆论监督和批评性报道都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 黄匡宇 /204
舆论监督迫切需要制度化 李良荣 /210
舆论监督是一种权力制约、社会民主和政策检验机制 邵培仁 /213
《新闻法》应对舆论监督进行实质性界定 孙旭培 /220
使用“隐性采访”要慎之又慎 童兵 /225
应进一步开放法律允许的信息源 徐耀魁 /229
新闻也要走向法治——访魏永征 /232

第四编 研究“焦点” /241

- 关于“焦点访谈”课题的研究报告 郭镇之 /243
关于《焦点访谈》的“焦点群体”研究 郭镇之 /269
对《“焦点访谈”系列丛书》批评性报道的内容分析 郭镇之
赵丽芳 /314
对《焦点访谈》收视率统计资料的二度分析 郭镇之 沈浩 /341
舆论监督、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 郭镇之 /353

1

第一编

“焦点”自述

一个栏目
一群人
一项事业

本篇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专业人士对《焦点访谈》发展概况的介绍，内容包括经验体会文章和“焦点”研究课题组对记者编辑的访谈。



《焦点访谈》的发展概况^①

袁正明 王旭东

一、《焦点访谈》栏目的设立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发表以后，又一次思想解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逐渐形成。中宣部部长丁关根1993年初在一次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做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②他还具体指示：“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要增大信息量，增加新闻播出次数。”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推动下，中央电视台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既有体制的，也有节目的），一批贴近群众、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在新闻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从1993年3月1日起，第一套节目首次实现了新闻的滚动播出，当年新闻的播出时间和发稿量大幅度提高。而这一改革更具实质意义的标志是《东方时空》的开播。《东方时空》是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个早间栏目，也是第一个大型杂志类板块栏目。它有4个形态各异、内容不同的子栏目《东方之子》、《东方时空金曲榜》（后改为《音乐电视》，1996年1月27日栏目改版时被取消）、《生活空间》、《焦点时刻》（1996年1月27日后改名为《时空报道》）。虽然4个子栏目都有新意，但《焦点时刻》更为引人注目，因为它播出了大量真实、尖锐、鲜活的报道，特别是一些批评性报道，回答或聚焦了“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如《洋河污染导致大片农田绝收》直接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此节目获当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二等奖），给新闻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在《东方时空·焦点时刻》成功探索的基础上，采取更大的行动扩大战果就成为推进改革的必然要求，《焦点访谈》就在新闻评论部成立5个月以后水到渠成地诞生了。杨伟光台长总结说：“中央电视台1993年5月1日开办了《东方时空》栏目，是加强新闻评论的第一步，里面有一个小栏目《焦点时刻》，就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访问专家、学者、干部、工人、农民，在节目中

① 这篇文章成文于1998年。

② 摘自丁关根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3年1月18日。



开展讨论，播出后引起强烈的反响。1994年4月1日在每晚《新闻联播》之后创办了《焦点访谈》，让评论性节目进入晚间黄金时间，这是加强新闻评论的第二步。”^①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

《焦点访谈》也是中国观众家喻户晓的一个电视栏目，是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之一。它长期居于收视率最高的十个栏目排行榜的第二名（各地必须有一套节目保证完整转播的《新闻联播》，一直是第一名）。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约有3亿人，每天有上千名观众给这个栏目打电话、写信、发传真和电子邮件，反映他们的收视意见，提供大量的报道线索。《焦点访谈》开播以后，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传达室，每天有数百人来找《焦点访谈》反映情况，为此，新闻评论部在这里设了专门的窗口，接收观众送来的材料。

《焦点访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注的一个电视栏目。江泽民同志曾在看完《焦点访谈》节目后马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对节目中反映的问题表示关注，敦促有关方面迅速解决问题。^②李鹏同志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专门为《焦点访谈》题词“焦点访谈 表扬先进 批评落后 伸张正义”，肯定了《焦点访谈》的方向。之后不久，他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证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做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让他们更多地通过新闻舆论对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对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朱镕基同志称“每日必看《焦点访谈》，从中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材料”，并多次以《焦点访谈》报道的内容为依据阐述国家的方针政策，对有关方面的工作做出决策指导，^③他说《焦点访谈》“是中央工作的一部分”。胡锦涛同志称自己是《焦点访谈》的忠实观众。^④李岚清同志也多次调看《焦点访谈》节目，与栏目的工作人员深入座谈。可以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和支持，对《焦点访谈》栏目的直接关注，是这个栏目得以生存和发展、新时期中国的舆论监督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由于受到方方面面的欢迎，《焦点访谈》的多个节目在新闻评奖中屡获殊荣，在1995年、1996年两年连获中宣部评选的“中央新闻单位名栏目”称号。

^① 杨伟光：《新闻改革的可喜收获》，载《电视研究》，1998年第7期。

^② 1998年4月2日《在补碘的名义下》、5月18日《不防即是患》两次节目播出后很短时间，江泽民同志就打电话给有关省市和部门的领导同志，对小学生的健康和防火问题表示关注。

^③ 1998年7月27日至30日，朱镕基在内蒙古和山西考察工作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时如是说。根据《盗伐危及大动脉》一期节目反映的情况，朱镕基总理指示，国家将不再政策性地砍伐一棵天然林木。从1998年8月1日起，这一规定开始执行，百万林业工人分流转岗。

^④ 1998年7月18日上午，胡锦涛在接见第三届全国青年专家国情考察团时，与《焦点访谈》节目主持人敬一丹交谈，自称是《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的忠实观众。



《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在1994年4月1日开办的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每期13分钟，每天19点38分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出，次日8点22分在这套节目中重播。

《焦点访谈》在节目管理和制作上采用制片人制。制片人是栏目的管理者和节目创作的组织者与把关人，也是节目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对节目的全程制作、经费使用、人员调配具有决定权。新闻评论部是国内将制片人体制引入新闻节目制作的第一家，《焦点访谈》是采用这种国际上通用的先进管理方法的第一批试验田之一。在它的催动下，中央电视台又在人员的引进和管理上实行并逐步推广了面向社会公开、公平吸纳人才的招聘制。招聘制解决了享受国家事业拨款的正式人员编制不足和电视事业高速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克服了节目质量提升乏力和从业者竞争动力疲弱等体制弊端。这些体制探索为我国电视新闻乃至整个新闻事业的深层次改革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借鉴。

《焦点访谈》在节目形态上采用演播室主持和现场采访相结合的结构方式，使报道有着落、评论有依据，述与评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焦点访谈》在几年中推出的一批较为观众认可的“记者主持人”，也因其来自采编第一线、具有较高的新闻工作素质和理论素养，确立了自己在电视新闻传播流程中的位置。他们正按照新闻评论部和《焦点访谈》缔造者们既定的目标和进程，由“记者主持人”向“主持人”、中国第一代电视新闻评论员一步步前进。

《焦点访谈》的制作群体由一百多名制片人、主持人、编辑、记者和技术人员构成，他们分为中心组（编务会的执行机构，负责节目的策划和协调）、记者一组、记者二组、国际组（也可向《东方时空·时空报道》提供节目），每日一期地从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生产。

三、《焦点访谈》的运作模式

到1998年6月30日，《焦点访谈》已经运行了四年多，播出1471期，在选题、采访、编辑、主持等环节上探索前进，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1. 关于《焦点访谈》的选题和报题

(1) 选题原则

在《焦点访谈》开播之前，创办者们就为它定下了三句话的选题原则：“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三句话的坐标定位如同X、Y、Z三条轴线，从质和量两个角度给出了判断一件素材是否可以作为焦点节目选题的标准。“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两条认定选题的质的坐标线，它们分别从社会结构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散射出来，在某些事件或现象上交汇，反映着不同社会组织细胞或群体的共同利益或价值观；“普遍存在”是量的坐标线，它将衡量某些事件或现象涉及的组织细胞或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道这些事件或现象的节目是否能在社会中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



共鸣。三句话简单明了，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以1998年6月至7月《焦点访谈》连续播出的几个有关粮食收购、储存、销售的节目为例，在3月19日朱镕基总理面对中外记者介绍新一届政府的任务时，他就把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作为五大改革之一，提到政府的工作日程上来，不久，他到安徽农村视察，主要考察的就是粮食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粮食的生产、购销、储备问题，当然应该是一国总理在国家管理中首先要考虑的头等大事。而几年来，虽然围绕粮食生产水平、粮食购销价格、农民负担等问题，国家制定了很多政策、拿出了很多资金，但粮食亏损、给农民打白条、卖粮难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亿万农民和农村干部更是盼着国家能深入了解粮食问题的症结所在，彻底革除困扰我们的粮食流通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只要看一看每天农民给《焦点访谈》寄来的大量信件，就可以知道这种渴望有多么强烈。《焦点访谈》在短时间里播出了六期节目，曝光了一些粮食部门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违规操作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给农民的利益带来的巨大损失。有的低价私卖国库粮，亏损报国家，粮款归自己；有的低级低价收农民粮，高级高价卖国家粮，坐吃巨额差价；有的假造收粮账目，套取国家购粮款与粮损补贴。六期节目中被批评的单位分布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苏、黑龙江、安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问题存在的普遍性。

在上面的叙述里，“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三句话各有其准确的对位，它们在粮食流通这件事上交汇、重叠，为《焦点访谈》选题提供了一个解析例题。让我们再看一个例题。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将播出第一期节目。而这一天人们关注的事情是各不相同的：这天是周五，第二天就是大周末，有人在考虑周末怎么过了；这天是西方的愚人节，不少人在考虑怎么给别人开一个精彩的玩笑或防备着别人开自己的玩笑等等。同时这一天，也正是1994年国债发行的第一天。在这之前，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已经多次强调、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本年度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确实有了很大改进，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力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有关部门的领导正密切关注着这第一天的发行情况；这一天，全国城乡千家万户的普通老百姓也在关注着国债，大家都想了解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也想看看别人的抉择，而且国债发行的具体运作，在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可以说，从整体上看，4月1日这一天，中国境内的头等大事，就是本年度的国债发行了。《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们在全面深入地分析、认真充分地准备之后，推出了多点报道的首期节目《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①由这两个例子可以知道，《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

^① 王旭东：《〈焦点访谈〉选题透视》，载《电视研究》，1994年第9期。



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如果肢解这三句话，就有可能造成偏差或误导，产生大的负面影响。

焦点问题既然是上上下下都很关心的普遍问题，它们往往就是诸多矛盾的集结点。正视矛盾，不回避问题，并积极地寻找解决办法，就能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得到观众的关注和信任，就能树立舆论权威，容易造成良好的社会效应。这是确定“三句话原则”的基本考虑。

(2) 明确栏目舆论监督的职能走向

《焦点访谈》的缔造者多次强调栏目工作人员的党性与职业守则。如新闻评论部的第一任主任孙玉胜，曾在1994年9月20日（《焦点访谈》开播5个多月后）的一篇文章里写到：“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评论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的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①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写到：“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对热点问题进行报道不仅是新闻媒体本身的需要，而且是观众的需要，同时也是政府的需要。”有了这样的认识，在实践上就敢于向长时间被视为禁区的舆论监督进击，并在进击中检验和校正认识。

四年多的实践可以说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和选题定位是符合观众的收视需求的，即观众对栏目的职能希冀基本上可以认定为舆论监督。正确理解“正面宣传为主”的精神实质、准确选择符合栏目定位的题目，就有可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反之，就会违背观众意愿、模糊栏目特色、抑制节目功效。应该说就是在这样的实践（可以理解为市场）引导下，《焦点访谈》逐步明确了自己的内容定位和职能定位，找到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为主的契合点。

(3) 报题程序

《焦点访谈》虽然敢于碰硬，敢于触及敏感问题，但它的成活率和成功率并不低，由于选题问题而在完成之后不能通过审查的节目几乎没有。这是因为，严谨的三级报题程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首先，记者或编辑要对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进行筛选，对比较有把握的题目作出基本分析和判断，确定采访思路和重点，向制片人汇报。为了扩大视野和选题面，从1995年8月起，新闻评论部专门设立了信息机构，收集来自各种媒介、各地观众的新闻线索和节目信息，每天打印分发，及时捕捉和跟踪

^① 孙玉胜：《所能想到和做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首届韬奋新闻奖文集·孙玉胜篇》。



新闻。

第二步，制片人根据事实本身和他所掌握的更广泛的背景，结合节目组的运作（包括他对全组人员个性、特长的掌握），对这一选题再论证，初步决定做与不做。如果决定做，就向部主任（总制片人）汇报。

第三步，部主任最后对这个题目把一道关，最终决定做和怎么做。对一些重大选题，如果部主任拿不准，还要请示主管台长。

在这个程序的始终，有一张选题表在流转，上面写着选题依据、拍摄地点、预播时间，记者（编辑）、制片人、部主任要在上面签名以表明对此选题承担责任，如有必要，部主任还要写上具体意见。选题表在电脑操作的选题管理系统中备案，避免重复，并便于查询和统计。

从1998年初开始，新闻评论部设立了一个《焦点访谈》中心组，负责整个栏目的策划协调。中心组每周召集两次编务会，通报节目运作信息，安排节目播出，相关制片人、主持人、策划人员参加，重要选题、需要分合的采编行动由编务会确定。

2. 关于《焦点访谈》的采访和拍摄

《焦点访谈》的日常节目以“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为基本形态和表现样式，^①采取“多报道少评论”，以发挥电视形象性强、现场感强的优势，避免空洞的说教。因此，采访和拍摄在节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1）采访

《焦点访谈》的记者必须掌握的一个工作原则是“让事实说话”，即记者的所有结论必须有节目中事实的支持，这就要求记者不能道听途说，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到事实发生的现场去亲自调查。不管是辨认提供线索的匿名者还是寻找突破障碍的蛛丝马迹，不管是在非法猎象者出没的原始森林还是在余震不断的地震灾区，不管是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还是骄横霸道的官僚，记者都不能畏缩，都必须千方百计采访到第一手的材料。“让事实说话”是坚持新闻本体的当然结论，是记者作为新闻工作者不越权、不越位的根本角色限定。

如果说“采访必须到现场”是所有新闻记者都应做到的职业要求，那么《焦点访谈》的记者在此基础上还有属于电视媒介、属于这个栏目的一些特殊的采访原则：

节目中的事实应该包括当事人的各方发表的意见，记者要力争采访到当事各方，特别是第一当事人，即使他是一个千夫所指的恶棍。无论他如何为自己狡辩（如《“小康村”的秘密》中的乡长说，因生活贫困而卖血交提留款的农民

^① 这四句话原来在节目开始时的栏目片头里，从1998年4月1日后停用。



“我想这可以提高心脏的造血功能”),无论他如何不合作(如《惜哉文化》中的市长对记者的提问,连说数句“无可奉告”,《“罚”要依法》节目中违法交警躲避和捂镜头、抢机器),都要摄取他发表的意见或发表意见的方式。

节目中的事实应该是看得见的流动的过程、符合电视传播线性特点的叙述过程,记者应力争通过自己的采访让过程说话。这一过程可以是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如《收棉时节再访黄梅》中记者采访到的棉纺厂违规收棉、村里欺骗记者组织农民向棉花收购点交棉、记者回来后棉纺厂继续收棉的全过程),也可以是记者的采访调查过程(如《咸宁工商取财有“道”》记者与工商局长两次接触的全过程),还可以是记者通过采访再现的事情发展变化过程(如《管文物还是“吃”文物》节目通过记者的采访,再现了26万元的文物发掘经费如何被层层贪污,最后只剩一万多元,致使发掘工作无法进行的各个环节)。过程能制造悬念,有推动力和结构功能,能连接环环相扣的事物的因果关系,“让过程说话”是《焦点访谈》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富有表现力的电视新闻评论的话语方式。

节目中的事实应该是充满了细节的事实。细节具有无可比拟的描摹作用和感染作用,是新闻节目形象化不可少的要素之一。记者应该在现场尽可能准确地捕捉和放大细节,揭示事件的实质、人物的心理状态。比如《“罚”要依法》中,记者发现了乱罚款的交警手里拿着的一沓现金和罚款单,就抓拍了这个细节,并问这个交警,既然是刚上岗,那他手里的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一问而击中要害。还是在这个节目中,记者在“执行政策 遵章守纪 文明执勤”的标语牌前采访交警的教导员,问这块牌子是不是他们竖的。心虚的教导员矢口否认,说是煤站竖的(观众明白煤站是没有执勤任务的),继而又觉不妥,说“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违法交警在响亮的口号前又想抵赖又感羞愧的复杂心理,被这个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细节的捕捉和放大当然要靠出镜记者和摄像记者协同完成。

具体的采访方式可因记者身份的明暗分为显性采访和“隐性采访”。《焦点访谈》要求自己的记者在显性采访中,敢于和采访对象正面交锋,敢于通过语言、情感和心里的多回合较量直接击碎谎言,得到真实信息。如在《义务教育何出高价》节目中,记者先问山东师大附属小学的校长,是否向学生收了赞助费,校长无比诚恳地说“我们没招一个择校生,没收一个收费生”;记者当场拿出一份6000元的收据请校长解释,校长极快地掠过一丝慌乱后,很快平静地撒谎说,是极个别的家长自愿交的赞助;记者紧追一句:既然是自愿就应该想拿多少拿多少,为什么要求一样多?校长无言以对。在《让棉花不再沉重》的一段采访里,记者用的是欲擒故纵、迂回包抄的战术:“本来他在购买棉花时,收受对方两万元贿赂,事实很清楚,他自己也供认不讳,但在采访当中,他却反复说,对棉花掺假并不知情,纯属受骗上当。接着就表白自己为厂里东



奔西走如何辛苦。我顺着他的话茬问‘现在棉花好买吗?’‘不好买。’‘是一般的不好买,还是非常难买?’‘非常难买。’‘也就是说棉花完全是卖方市场了?’‘是的。’至此,他还沉浸在表功的情绪当中,全没意识到这是个套。我接着问:‘既然是这样,你作为买方,应该你求他才对,他怎么会倒给你两万块钱呢?’‘……这我就知道了。’这个解释显然很不合理。对观众的判断力而言,这就足够了。”^①《焦点访谈》的记者还敢于利用“隐性采访”深入虎穴与对手周旋,获取显性采访无法得到的节目素材。记者曾假扮不法之徒,与倒卖恐龙蛋的真罪犯讨价还价,也曾化装成好色的商人,到搭售黄色录像带的犯罪分子的家谈生意,曾以游客的身份,两进算命公司使算命者失算,也曾扮作搭车人,与乱收费的警察斗智斗勇。“隐性采访”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谋,工作难度不亚于侦察员,危险又高于侦察员,因为记者没有武器,没有“里应外合”,只有忠诚和机智。

(2) 拍摄

电视新闻采访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摄像记者。《焦点访谈》在采访阶段,一般由一名出镜记者和摄像记者组成一个组。在做舆论监督类的节目时,这名摄像记者肩上的任务可谓艰巨异常,远不是几公斤重的摄像机的分量。

摄像记者要和出镜记者一起吃透节目精髓,掌握拍摄重点,设计拍摄方案,选择适用设备,熟悉机器的性能(包括“偷拍”设备的准确操作)。

在现场,摄像记者既是灯光师又是录音师。他要保证在自然光、正常环境里拍到技术质量合格的素材。他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抓拍到稍纵即逝的现场画面。他要与出镜记者保持不易觉察的默契,获得节目必需的证人证言证物(《收棉季节访棉区》中,摄像记者在非法收棉点“坚壁清野”藏起了人证物证之后,抓拍了冒热气的茶杯、没有来得及穿走的衣服、“来这儿玩”的人头上粘的棉花,传达出此地正在非法收棉的信息;《惜哉文化》中由于对方拒绝采访,摄像记者无法拍到画面,但他机智地录到了副市长连说几次“无可奉告”的声音,准确地传达了市里的态度)。在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他要保护设备、保护素材带。

在拍摄的全过程,《焦点访谈》的摄像记者还出演过不少意想不到的角色:

在《“罚”要依法》中,摄像记者扮作搭车人,自演自拍了一段与收费交警讨价还价的精彩片断,他用哀求激怒了警察,使警察露出了路霸的原生态;

在《订货还是订“祸”》中,扮作销售科长的摄像记者在“经理”与搭售淫秽录像带的犯罪分子谈不拢时,装作特别想看录像带的年轻人,只身进入对方的卧室,在对方的眼皮底下用普通的家用摄像机完成了任务;

^① 赵微:《掂一掂棉花的分量》,《焦点外的时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